学术专论

同治初年《治平宝鉴》的编纂逻辑及权力意涵

刘 炜

[摘要]《治平宝鉴》是辛酉政变后清廷为两宫太后编纂的垂帘听政政教典籍，系统辑录后妃辅政案例，学理上确立后权主体、德政优先、融合圣王与孝悌伦理三大特征。其编纂旨在弥补两宫理政经验缺失。现存故宫残本约为原书七成。学界对此书长期缺乏重视，更乏对其政治意涵与历史定位的专论。本文在考订其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的基础上，剖析书中危机驱动的政治文化逻辑与权力合法化叙事，以挖掘其深层权力意涵。

[关键词]《治平宝鉴》 辛酉政变 两宫太后 编纂逻辑 权力意涵

[**中图分类号**] K25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6）－01－0117－011

《治平宝鉴》是辛酉政变后清廷为两宫太后编纂的教科书，由张之万等奉旨纂修。成书于同治初“垂帘”“议政”双轨制确立之际，其不同于传统政书范式，系统辑录历代后妃辅政案例，构建垂帘听政知识体系，凸显特殊政治需求。此书编纂以弥补两宫理政经验缺失为核心，侧重帝王治术与贤后临朝典故，具有鲜明的宫廷政治教育功能。该书藏故宫图书馆，现存约七成内容，2001年《故宫珍本丛刊》第341册影印刊布孤本，然因晚清政治史研究趋冷及印量稀少，学界尚未深入挖掘其价值。[①] 现有研究多止于文献提及，基础信息也有讹误，更无专论探析其政治意涵与历史定位。作为辛酉政变关键衍生文献，其编纂历程和历史背景，其书写特色所代表的政治文化，亟待结合原始文献与历史背景进行系统研究，以挖掘此书历史经验书写的政治文化意涵。

[收稿日期] 2024-11-26

[作者简介] 刘炜（1989— ），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 250000，148252018@qq.com

① 1998年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吴樵子点校的《治平宝鉴》，疑为伪作。封面标榜的“清末臣僚争相手抄”“民国官宦掌中秘籍”流通情况，并无根据。《治平宝鉴》的流通限于讲臣和太后少数人间。另，点校本前言称基于十二册“手抄本”来源并重新分类编排，然而与2001年故宫影印本对比，存在两大疑点：一、内容完全不符，原本涵盖汉代至明代史事，点校本却涉清代，并增慈禧与讲臣策问对话；二、书中策问环节张之万参与其中。但实际上，张是编纂者，而非讲臣。总之，此本疑点颇多。《治平宝鉴》在相关著作与史料中被反复提及。1978年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的“辛酉政变”专题辑录关于此书的几则档案。除《清实录》、上谕、奏折等官方文献外，清人吴庆坻的《蕉廊脞录》、民国徐珂的《清稗类钞》均有论述。今人著述中，宝成关、高阳、楚双志、左书谔、马平安等人的论著均对《治平宝鉴》有过简介。期刊论文方面，近年以乔治忠2017年于《河北学刊》发表的《清道光朝之后若干官修史籍论略》为代表。学位论文方面，刘林海2022年的《撰述、刊刻与应用：〈帝鉴图说〉与〈养正图解〉研究》中对此书有简要的比较研究，其将《治平宝鉴》与《帝鉴图说》类比，认为后者在呈现形式方面对前者有所影响。

一、《治平宝鉴》的历史背景和编纂历程

辛酉政变前夕，李慈铭的《临朝备考录》为《治平宝鉴》奠定史源基础。这位周祖培门下士，在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初四日记中，系统梳理汉晋宋辽八位临朝母后事迹，其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政变集团的政治需求。① 李慈铭与政变核心人物周祖培、潘祖荫密切交往，这使其成为推动垂帘听政的重要智囊。② 辛酉政变后，贾桢、周祖培等重臣请太后垂帘之折历数古史母后临朝之事，均引李慈铭《临朝备考录》事例。③ 八位临朝母后史事，多被以后的《治平宝鉴》编者采纳。

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慈禧、奕䜣发动政变，以雷霆之势逮捕顾命八大臣。十月初六日上谕将咸丰遗诏定性为“造作赞襄”④ 之矫诏，彻底瓦解肃顺集团。此后，新当国者惩治肃顺党援陈孚恩等前朝高官以威慑群臣。当一切政治奖惩尘埃落定，政治履历匮乏的太后命翰林诸臣编撰古代女后临朝之事，借编书“慈览”之由，增进个人政治认知。

辛酉政变后的权力重构中，恭王与两宫形成新权力联盟。双方虽大权在握，但执政基础的差异性导致其面临截然不同的政治境遇。作为前朝领班军机，奕䜣凭丰富的官僚体系运作经验，在朝堂拥有天然权威性；而两宫则需直面传统性别政治困境：在奉行“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观念的帝制框架下，她们必须通过创造性诠释儒家伦理，将“母仪天下”的礼法规范转化为政治资本，逐步构建“垂帘听政”的特殊权力范式。

鉴于清祖制严禁后宫干政，初涉朝政的两宫，亟须通过史籍研习构建政治正当性并汲取治国经验。首先，咸丰帝遗命给太后钤印权“以为符信”，⑤ 但并未准两人垂帘。再者，在清代君臣捧为通史至尊的《御批通鉴辑览》中，亦可窥乾隆帝反对母后干政的决然态度。⑥ 故此，太后亟待借传统文化资源提高历史认知，寻求执政根据。

面对政变后的肃杀氛围，奕䜣、慈禧集团在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八日颁谕，着力营造“各抒所见”⑦ 的言论环境。朝廷呼吁马上奏效。十月十四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响应朝廷号召，其大谈治术：“窃臣维为治之道，治末不如正本，敬始乃可图终。”“正本敬始”分三条，首条“考典章以维治法”论及：

> 臣愚以为宜请旨饬下翰林诸臣：于列圣实录、宝训，敬谨寻绎其尤为简明切要者，恭纂一编。更于汉唐以来母后临朝各事实，择其可法可戒者，不假修饰，据史直书，汇为一册，恭录进呈。皇太后听政之暇，即由各衙门值日之卿贰诸臣轮班召对，隔帘侍讲。⑧

此条目可视为《治平宝鉴》提纲，徐启文是发起人。提议含资料取材、书写形式、讲授方式等要点，全盘为朝廷接受。他提出编撰帝王政事后，特突出“更于汉唐以来母后临朝各事实”，为太后垂帘张目之意明显。

两宫对折中编书以“正本敬始”的建议极赞同。她们在徐上奏一天后，以同治帝名义颁谕：

> 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列祖、列宗丰功伟烈，振古铄今，载在实录、圣训，炳若日星，向由内阁每日恭进，奉为成宪。朕以冲龄践祚，尤应朝夕循通，以为法守。著仍照

---

①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 3 册，广陵书社，2004 年，第 1890 页。

② 《清史稿》卷 491《文苑传》。

③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中华书局，1978 年，第 104 页。

④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115 页。

⑤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85 页。

⑥ 乾隆帝对武则天之厌恶见《御批通鉴辑览》卷 52 至卷 53《唐》; 对宋仁宗太后之嫌恶见《御批通鉴辑览》卷 74《宋》。

⑦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121–122 页。

⑧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123 页。

旧章，分日恭进，用资讲习。至现在内外庶政，均赖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定，并承慈命，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前史垂帘事迹，著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等择其可为法戒者，据史直书，简明注释，汇为一册，恭呈慈览。该大学士、总裁、翰林等于汇纂成书后，均著交议政王、军机大臣覆看，再行缮写进呈。钦此。①

由上谕下发时间知，此书编撰始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五日。编撰虽奉懿旨办理，成书后却需经恭王和军机大臣检阅，再呈太后阅览。这明示此书将受清廷最高统治核心成员的集体审定，成为官书。

辛酉政变前后，胜保、贾桢等满汉大臣的奏折影响《治平宝鉴》中女后叙事的建构。政变前两日，胜保上奏支持太后听政，以宋宣仁太后垂帘旧例为据，称其“女中尧舜”② 的典范意义，成为政变前较早公开从历史资源论证垂帘合法性的文献。此书中该人物独设六条，居女主条目之首，显见胜保奏议对编者的直接影响。晚清吴士鉴所撰《清宫词》称：“《宝鉴》编成号治平，宣仁初政致清明。”③ 正与胜保奏折中叙事呼应，印证《治平宝鉴》通过强化宋代女主“元祐之治”的历史记忆，突出女后主体作用。

政变后，贾桢、周祖培等汉臣联名上奏更具系统性，在承认清朝无垂帘之制的前提下，援引此前历史上八女主临朝案例，强调两宫并尊合理性。④ 其奏折特举明神宗嫡母陈后与生母李后共治之事，与《治平宝鉴》将此二后列为独立条目形成对应。⑤ 书中对宋代高太后与上述明代两太后的着重书写，反映了奏折中两宫共治政治设计的现实投射。

取材方面，《治平宝鉴》成书，编者潘祖荫进言：“顾溯羲轩以迄明代，数纪传以及编年，充栋为繁，焚膏莫究。欲裨圣治，贵举大纲。”⑥ 此书取材自伏羲轩辕始，至明终。但该书实际从汉写起，史官对材料进行过大量删削。

同治元年（1862）三月二十五日，此书告成。编者礼部右侍郎张之万、太常寺卿许彭寿、光禄寺卿潘祖荫，翰林院编修鲍源深、修撰章鋆及编修杨泗孙、李鸿藻、吕朝瑞、黄钰共九人得两宫懿旨褒奖，赐名《治平宝鉴》。⑦ 编者均为汉臣。编纂时间为：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始，次年三月二十五日终。上谕和原书每卷末署名都明确九位汉臣编纂，均未言明总纂人选，但谕旨和原书卷末署名，张之万均列首位，推测其实际承担总纂职责。分工上，从原书卷末列名看，为九人共同编写。九人皆为道光末至咸丰初进士，⑧ 多为翰林院编修，兼具经史素养与编纂能力；领衔者礼部右侍郎张之万、太常寺卿许彭寿、光禄寺卿潘祖荫，三人分掌礼制、祭祀、宫廷事务，兼备科举身份与中枢实务经验，确保编纂既符儒学正统，又对接清廷现实政治需求。⑨ 从对九臣均等褒奖观之，太后对编修成果甚满意。

此书编成未马上开讲。同治三年五月命大臣为两宫授课，《清实录》载：

著瑞常、宝鋆、载龄、李棠阶、单懋谦、徐桐，于本月二十七日起，每日轮派一人，由议政王带领进讲。瑞常等于进讲之时，务当剀切敷陈，言必尽意，毋得稍有避忌，用副集思广益

①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126 页。
②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100 页。
③ 孙家鼐：《书经图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 年，第 2 页。
④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104 页。
⑤ 张之万等编：《治平宝鉴》，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海南出版社，2001 年，第 180 页。
⑥ 吴庆坻：《蕉廊脞录》，中华书局，1990 年，第 4 页。此文字当取潘祖年编：《潘文勤公年谱》，光绪刻本，同治元年壬戌条，第 21 页。
⑦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140–141 页。
⑧ 张之万、许彭寿、鲍源深三人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潘祖荫、章鋆等六人为咸丰二至三年进士。
⑨ 九大臣生平资料源于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年谱》，中华书局，2014 年，第 84 页。

至意。[1]

这是大臣为太后讲授《治平宝鉴》之始。同日翁同龢亦记此事。[2] 讲课由议政王领进，此外，醇王奕譞、锺郡王奕詥等王公亦有领进，大臣隔帘跪讲。“跪讲书”[3] 为李棠阶日记明载。主讲人为：瑞常、宝鋆、载龄、李棠阶、单懋谦、徐桐、翁同龢、文祥等满汉大臣。编纂者一律为汉臣，而讲授者以帝师、军机大臣、大学士等满汉重臣为主。此举隐含权力制衡：翰林编纂提供学术支持，而满汉重臣讲授更能确保内容符合执政集团利益。

为何“跪讲”？徐桐门人文廷式言：

> 同治初年，儒臣撰进《通鉴节抄》二十卷……及发出所讲之书，即前所进节钞《通鉴》之本也，赐名《治平宝鉴》。八人轮班进讲于养心殿，太后垂帘听讲。恭亲王曰：“经筵之礼，以尊经故，立讲；此所讲，史籍也，应跽讲。”从之。三年而后终二十卷。[4]

可见“跪讲”源于奕䜣的礼制裁定：传统经筵讲儒家经典时，讲官可站立以示尊经；而此书属史籍，非正统经学，故为跪述。

书名颇有意味。初名《通鉴节抄》，宋前史事多取《资治通鉴》。《枢垣私记》载：“时拟进赐书名四,一《治平宝鉴》，一《几余鉴古》，一《万年玑镜》，一《法工时编年》。”[5]《治平宝鉴》当选，因其名直指核心，兼具政治寓意与现实诉求。“治平”出自《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既契合儒家治国理想，又暗合清廷追求长治久安的政治愿景；“宝鉴”则显典籍镜鉴功能，呼应纂修“可为法戒”事迹的务实取向。

翁同龢记开讲之始，亦录授课之终。他为最后一课讲臣：

> 是日进讲“明庄烈帝诛客、魏”一段，因推阐案语中“去邪不尽，任贤不笃”二语，援引古今，剀切言之，太后垂问数语即退。《治平宝鉴》法编十二册至此而终，以后进讲与否且候进止。[6]

据讲臣翁同龢、李棠阶所记，所授内容只见法编，不见戒编，可推定两年半授讲内容为前十二册。故文廷式言“三年而后终二十卷”[7] 有误。翁讲课“援引古今”，讲臣并非照本宣科，授课有个人发挥余地。翁氏日记载：“出神武门访晤树南，以《治平宝鉴》假我。”[8] 树南是李棠阶的字，说明此书存讲臣之手供备课用，以便授讲“援引古今”达“言必尽意”之标准。

两宫重视研习此书。自同治三年五月始，至五年十月终，两宫学习两年半之久。首先，太后对此书热情较高。讲者通常辰正（早上八点）受召，午初至未刻（早上十一点到中午一点）才离开。李棠阶气力不足，也从巳初（早上九点）讲到午刻（中午十二点）。唯太后抱恙、有所“欠安”[9] 才停课。再者，太后对此书学习主动性强，“提问式”研习见其专注力。翁氏授课尾声，“太后垂问数语”。[10] 此时其对史事仍有积极思考。

太后在《治平宝鉴》讲席之垂询聚焦三条主线：其一，通过考辨元泰定帝设经筵、明张居正进讲《帝鉴图说》等事，探求儒臣训导与君王治政实效的关联，实借讲书增进太后史识，为

---

① 《清穆宗实录》卷 104，同治三年五月癸亥。
②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 1 册，同治甲子五月条，中西书局，2012 年，第 359 页。
③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岳麓书社，2010 年，第 1080 页。
④ 文廷式:《知过轩谭屑》,《文廷式集》卷 8，中华书局，2018 年，第 1054 页。
⑤ 许宝蘅:《枢垣私记》，许恪儒整理:《巢云簃随笔》，中华书局，2018 年，第 18 页。
⑥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 2 册，同治丙寅十月条，中西书局，2012 年，第 520 页。
⑦ 《文廷式集》卷 8，第 1054 页。
⑧ 《翁同龢日记》第 1 册，同治乙丑十一月，第 459 页。
⑨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第 1079 页。
⑩ 《翁同龢日记》第 2 册，同治丙寅十月条，第 520 页。

两宫垂帘提供治术渊源；[①] 其二，以洪武孝政、元哀宗纳谏止杀、崇祯诛魏阉等例，剖析伦理与权术的平衡逻辑，为驾驭重臣提供历史参照；[②] 其三，重点钩沉元明两代（尤重明代）映射现实政局，如明宪宗、明孝宗断狱删律，[③] 明英宗减苏、松荒田租税等，[④] 对涉及本朝国政的阐释高度警觉，意在通过历史经验规训同治初狱政整顿、江南赋税治理等实务。这些追问构成史鉴的基本框架，将典籍转化为强化纲常名教与训导君权的政治工具。

二、《治平宝鉴》的文本分析和核心特征

《治平宝鉴》编纂内容，近来学者偶有提及，以乔治忠所论为代表：

> 这就是《治平宝鉴》纂修的官方记述，书成迅速，赏赐丰厚而各级纂修官所获均等，是一件令人注目的举措。《治平宝鉴》20 卷（今存 13 卷，北京故宫图书馆藏），选取汉至明代帝王政治，以及历代母后临朝执政的成功事迹，编辑为书。其中，收录帝与后共 108 人事迹，每人条目不等，计 314 条史事，加以注解并由纂修大臣撰写按语。[⑤]

这里未注信息出处，应是沿用故宫官网介绍或据《天禄珍藏》说明，两说法均存讹误。[⑥] 乔治忠所引人数和条目均是法编统计。需注意，法编也非“收录帝与后 108 人事迹”，唐太宗一人便列本书卷四、卷五两卷，故宫官网和《天禄珍藏》介绍此书“每位 1 至 23 条不等”亦有误，条目最多的唐太宗，卷四 15 条加上卷五 23 条，高达 38 条。此外，卷一汉明帝马后和汉章帝马太后、汉和帝邓后与汉安帝邓太后，卷八宋英宗曹太后同卷九宋神宗曹太后之条目，亦有重复，而卷十金主亮图克坦太后、大太后，虽为一条目，却列两人。所以，法编为 105 人，每位 1 至 38 条不等。

法编代表有益经验，戒编指陈政治教训。乔治忠认为此书“选取汉至明代帝王政治，以及历代母后临朝执政的成功事迹，编辑为书”，显然知本书有法编，而不知有戒编。戒编存后 4 卷目录，据目录，戒编有 39 人、109 条，以唐僖宗始，至明庄烈帝终。因两编人物重叠，剔除法编相同帝与后，剩 16 人。法编加戒编，本书已知条目现存：121 人、423 条。

学界对此书内容披露较少，借此考述，对其内容作小结：

据存世目录，此书共 20 卷，现存 13 卷，分为法编 12 卷（存世 9 卷，缺卷八、卷九、卷十一）、戒编 8 卷（存后 4 卷），时间跨度以汉高帝始，至明庄烈帝终。共计 121 人、423 条，每位 1 至 38 条不等，每条由正文、注释、按语三部分组成。仅见故宫图书馆藏本，未抄未刻而成孤本。此本为同治元年内府进呈朱格写本。版框 21.8cm × 14.6cm。每半页 9 行，行 20 字，四周双栏，单朱鱼尾，朱笔句读。有“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方形朱印。石青纸面，黄绫书签，包角，黄丝线装订。13 册 2 函。编成后，侍讲时间自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始，同治五年十月初二日终，讲授内容为前十二卷法编。太后听政之暇，由恭王、醇王等宗室领进，军机大臣、大学士、帝师轮班召对，隔帘跪讲。《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2001 年故宫博物院编，海南出版社影印出版，与《评鉴阐要》一并收录在《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

《治平宝鉴》学理建构彰显三大核心特征：其一，确立后权政治主体地位；其二，构建德政

---

① 《翁同龢日记》第 2 册，同治丙寅三月、九月条，第 477、518 页。

② 《翁同龢日记》第 2 册，同治丙寅三月、二月、十月条，第 482、475、520 页。

③ 《翁同龢日记》第 2 册，同治丙寅七月条，第 508−510 页。

④ 《翁同龢日记》第 2 册，同治丙寅五月条，第 493−494 页。

⑤ 乔治忠：《清道光朝之后若干官修史籍论略》，《河北学刊》2017 年第 5 期。

⑥ 故宫博物院编：《天禄珍藏——清宫内府本三百年》，紫禁城出版社，2007 年，第 334 页；《治平宝鉴》，网址：https://www.dpm.org.cn/ancient/mingqing/161804.htm，2024−11−01。

优先的治理体系；其三，深度融合儒家圣王理想与孝悌伦理纲维。

同治初垂帘听政的政治形势决定《治平宝鉴》书写特色：突出“后权”。同为皇室教材，此书承袭明代《历代君鉴》《帝鉴图说》宗旨，着重镜鉴功能，为教化帝王择古史“可为法戒”故事，它们在追求资政意义上相同。有论者认为《帝鉴图说》对此书最明显的影响在于呈现形式的两分法，其将内容分为两部是以事件本身曲直而非人物评价优劣划分标准。① 但此书与明式君王教材服务对象不同，编纂侧重有异。后者凸显“君”“帝”在古史的核心地位。《治平宝鉴》的服务对象则是政变后执政经验不足的太后，其编纂对历代临朝称制之事格外看重。

《治平宝鉴》书写序列上将多数同代太后置于帝王之前，映射晚清两宫太后权柄凌驾皇权的政治现实。潘祖荫在此书告成折强调其“撮举政治之兴衰，兼列宫闱之事迹”② 标准，但实际体例与宣称原则形成微妙悖反。以法编为例，十二对同代帝后中，仅宋太祖、宋理宗位列当朝太后之前，余者皆以太后居首。③ 这种编排突破范晔“并尊帝后”传统，更非简单沿袭宋代垂帘旧例，而是借历史文本的秩序重构，将太后塑造为独立政治主体。

《治平宝鉴》具积极意义的法编，女后政事占可观比例，在古代严格的礼法制度下，选取空前数量女后故事列入官书，有意强调太后执政的历史传承。《治平宝鉴》法编 105 人、314 条，女后占 35 人，占总人数三分之一，女后为 67 条，超过总条目五分之一。④ 在中国古代男权社会，比重惊人。

从目录可知，两编卷数相当。法编，女后占该编总人数三分之一，在总条目占比高达 21.3%。戒编，女后仅 4 人，占此部分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仅为此编总目的 3.6%。⑤ 法编女后比例远大于戒编。两者悬殊，是统治者授意、编者有意为之的结果。在男性主导的中古政治史中，主持者刻意将女后负面史事的戒编压缩，将正面有益经验的法编极尽宣扬之能事，给人历史上临朝称制、垂帘听政之贤后不乏其人，奸邪乱政、倒行逆施之妖后甚为罕见的错觉。言外意，较女后临朝的消极影响，其执政正面作用更显著。

正面宣扬，反面压制。本书对女后负面比例极尽压缩，颇具政治意涵，实质为对“后权”的政治庇护。戒编仅存四则女后德行可概括为：“无视孝道”“劳民伤财”“枉害忠良”“谋朝篡位”，每条都是女后干政恶果。从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书成到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开讲之间，共计两年余，这段时间对书内容应进行过评估，从后来开讲内容知，评估结果是只讲法编，不讲戒编。女后干政恶行挑战皇权威严，此类条目增多或宣讲都会污名化女后，触碰“后权”敏感的政治逆鳞，导致对垂帘听政可行性的质疑。

垂帘听政的现实政治亦决定此书突出两宫和睦史事。此题材于正史难觅，流播较广的是明神宗两后之事。此外，本书将史籍鲜为人知的五代唐明宗后妃曹后和王淑妃“两宫之间，始终无间”⑥ 之事亦单独列出。编者为强化两宫听政实务能力，遍稽前代典章，特择两宫无间史事，可谓索尽枯肠。

此书将明穆宗继后陈氏与明神宗生母李贵妃特意突出，以表“两宫益和”“两宫无间”⑦ 之深意。另方面，此书有意隐没两宫矛盾。纵观明代四次两后并尊，除书中提到明神宗两后外，其

---

① 刘林海：《撰述、刊刻与应用 :〈帝鉴图说〉与〈养正图解〉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年，第 101 页。

② 潘祖年编：《潘文勤公年谱》，光绪刻本，同治元年壬戌条，第 21 页。

③ 十二对同代帝王与太后中，因宋英宗曹太后与宋神宗曹太后为同一人，书中十一位太后为：魏太武帝窦太后、魏献文帝冯太后、唐高宗武后 (唐睿宗武太后)、宋太祖杜太后、宋仁宗刘太后、宋英宗曹太后（宋神宗曹太后)、宋哲宗高太皇太后、宋高宗孟太后、宋高宗韦太后、宋理宗杨太后、明神宗李太后。

④ “可法”共有女后 35 人合计 67 条。《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第 177−180 页。

⑤《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第 381、405、430、457 页。

⑥《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第 327 页。

⑦《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第 369 页。

余未见和谐景象，如英宗时，孙、吴两太后矛盾激化，孙将吴降为“宣庙贤妃”。[①] 再者，明神宗时“两宫无间”要因是帝王“孝事”。[②] 按政治逻辑，神宗善行应排两太后前，但却居两者后。最后，以神宗朝为例，后权盖过相权，又压制皇权。编者通过权力结构重塑建构女性政治权威。书中将李太后塑造为超越皇权的政治主体，其条目超过神宗，刻意淡化张居正的实际辅政作用。这种强调“母教”的叙事策略，为将相权转化为后权的政治修辞。

第一，《治平宝鉴》强调后权正当性，使皇权有所弱化，但对皇权正统的男性威严、男尊女卑的儒家观仍不敢僭越。此书关于武则天的三则史事[③] 均取自《资治通鉴》，[④] 后两则均发生在武称帝之后。但《治平宝鉴》仍称武为“唐高宗武后”，无疑受儒家“正统论”约束。宋以后受理学禁锢，女性地位每况愈下，主流史家对武氏评价低，对其入纪称皇一事持否定态度。[⑤] 此书编者的政治立场呈显著矛盾性。面对两宫政治诉求与儒家性别规范冲突，编者采取折中策略：既通过详述其政绩来合理化太后摄政，又严格遵循史书体例。书中对武氏的多面处理方式尤典型：其一，详载其治绩以证女主执政有效性；其二，摒弃“武皇”或“唐睿宗武太后”等彰显权力称谓；其三，采用“太后”这一中性称号。此策略反映其考量：表层顺应现实政治需求，内里坚守李唐正统与儒家性别秩序。编者通过称谓模糊化处理，既未突破男权政治框架，又为女性执政留下弹性阐释空间，构成对武周政权正当性的隐性否定。

第二，《治平宝鉴》通过大量案例表明，母后执政需以“德治”为本，融合历史智慧与务实策略。汉宣帝皇后被立为太子养母时，宣帝特选“素谨慎而无子者”。[⑥] 因其无亲族牵绊，全心抚育储君，此决策体现“以德择人”的政治理性。隋独孤后面对幽州总管献珠之请，直言“将士疲劳，未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以“有益于社稷”[⑦] 之务实态度消弭奢侈隐患。此揭示母后决策需超越个人偏好，以王朝利益为最高准则。

此书力倡“德治”，将君主贤明确立为政治伦理标尺。慈禧研习中对此产生共鸣，其与讲官的互动聚焦君主德性对治道兴衰的关键作用。太后垂询讲臣之史事颇具典型性：论及元泰定帝“开经筵、择师傅”，慈禧咨询翁氏“泰定之贤否”；[⑧] 对欲诛手足的金哀宗，慈禧“垂问金哀宗何如主云云”。[⑨] 谈及崇祯诛魏阉，慈禧“垂问数语”，直指书中史评“去邪不尽、任贤不笃”[⑩] 所示明代中枢权力运作深层症结。此类对君王德政的考辨，是《治平宝鉴》“以史证德”编纂理念的具象呈现。

处理复杂人事关系，史书亦提供镜鉴。一方面，抑制私欲是维系法统的关键：独孤后表亲犯法当斩，她力主“国家之事，焉可顾私”，[⑪] 坚持依法处决；金章宗太后训诫外戚“毋借吾之贵辄肆非道”，[⑫] 禁止家族干政。另方面，宽严相济方得人心：北魏冯太后发现御膳之蜥蜴，她“笑而释之”，[⑬] 以仁厚化解危机；汉安帝邓太后释被诬囚犯，借“澍雨大降”[⑭] 天象强化德政法统。此

① 《明史》卷 113《后妃传》。

② 《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第 369 页。

③ 《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第 287–289 页。

④ 《资治通鉴》卷 204《唐纪二十》、卷 206《唐纪二十二》，则天后垂拱三年、天授二年、圣历元年。

⑤ 韩宏韬：《武则天入纪公案与“正统”论》，《文史哲》2014 年第 6 期。

⑥ 《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第 194 页。

⑦ 《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第 235 页。

⑧ 《翁同龢日记》第 2 册，同治丙寅二月条，第 477 页。

⑨ 《翁同龢日记》第 2 册，同治丙寅二月条，第 475 页。

⑩ 《翁同龢日记》第 2 册，同治丙寅十月条，第 520 页。

⑪ 《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第 237 页。

⑫ 《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第 345 页。

⑬ 《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第 228 页。

⑭ 《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第 201 页。

表明母后需在法理与人情间把握平衡，以至公之心立威。

第三，《治平宝鉴》所载诸后形象深植儒家圣王观与孝悌伦理体系。书中强调仁、慈、贤、俭四德，如汉和帝邓后“性孝”，晋穆帝褚太后“仁慈”，宋明帝路太后“慈于非亲生”，陈宣帝柳后“慈惠谦和”，北魏太武帝窦太后“性仁慈”，陈后主沈后“身居俭约”，隋文帝独孤后“贤明”，唐太宗长孙后“性仁孝俭”，[①] 实为儒家“内圣外王”理念女性化转译。当母后通过劝诫帝王、体恤百姓展现政治才能，其叙事逻辑依托儒家伦理支点：君权层面，帝王以“侍奉”“敬奉”“供奉”[②] 的孝子身份出现，实质上将政治从属关系转化为伦理服从；母后层面，则借克制私欲、勤修妇德，完成从“后宫妇人”到“政治化身”的身份跨越。

此书对孝文化的政治诠释，在慈禧的治政实践中被赋予特殊权重。讲臣讲授明太祖“诏百官迎养父母者，官给舟车”[③] 的孝政时，慈禧询问朱元璋执政“尚宽尚猛”[④] 叩问仁政尺度。此询问将明初“宽猛相济”治术与孝道联系。典籍中“官给舟车”的行政举措，授以慈禧孝治之术，既显君主仁德，又通过官僚赡养责任强化纲常秩序。对历史孝治案例的具象研析，反映慈禧将儒家伦理视为维系垂帘体制正当性的文化资源。

这种形象建构隐含悖论：表面彰显女性政治权威，实为儒家宗法制的另类实现形式。书中对武则天称谓刻意模糊与对孝道伦理的强化，揭示编者立场：母后临朝仅是“母以子贵”机制的特殊延伸，其权力依附李唐法统而非独立存在。改革魄力如武后，其历史评价仍被置于儒家礼法的限定框架中。这种叙事策略既为女性执政预留解释空间，又确保其在“夫死从子”的儒家性别秩序内运作，堪称传统政治文化对性别越界现象的规训。

三、危机驱动的权宜性政治文化：《治平宝鉴》与同治初年政局互动

《治平宝鉴》为同治初年政局的重要文本，其编纂与传播反映晚清政治文化的复杂面向。从政治策略、制度调适到伦理叙事，该书集中体现于四维度：

第一，《治平宝鉴》形成植根于咸丰朝危机驱动的政治实践。面对太平天国运动与庚申之变的内外冲击，清廷在存亡压力下开启祖制变通的诸多先例，这些非常规举措为辛酉政变后的权力重构埋下伏笔。贾桢请太后垂帘的奏折中“外而贼匪未平，内而夷人逼处”[⑤] 的危机论述，正反映其实用主义政治逻辑的生成背景。这种危机驱动的实用主义逻辑，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朝臣对此书的默认态度。从朝廷上层反应看，无论地方大吏曾国藩，还是讲臣翁同龢和李棠阶，其日记[⑥] 显示，皆对该书保持默认接受态度。需指出，该书传播范围有限，仅在帝师、军机大臣等御前讲臣，领进者恭王等宗室，听讲的太后所构成的高层流传。现存时人日记中，既未见对该书褒扬，亦乏批评，整体呈心照不宣的接纳态度。

这种心照不宣的接纳态度，既源于对两宫权威的服从，亦表现出咸丰以降“事贵从权”[⑦] 的政治逻辑已渗透官僚体系。此种隐性共识达成，使书中对“女主临朝”的正当性论证逐渐被纳入权力运作的实践范畴，客观上为两宫垂帘的合法性提供历史与伦理依据。这种隐性共识不仅体现在朝臣的沉默态度，更通过《治平宝鉴》的讲授实践具象化。

---

① 《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第 200、217、221、225、226、235、281 页。

② 《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第 211 页。

③ 《明史》卷 3《本纪》。

④ 《翁同龢日记》第 2 册，同治丙寅三月条，第 482 页。

⑤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104 页。

⑥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二，岳麓书社，2012 年；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 1、2 册；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

⑦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91 页。

追根溯源，咸丰的两次祖制变通尤具典型意义：其一，启用亲王入直。咸丰三年破例委派恭亲王奕䜣入军机处，打破“故事，亲王不假事权”①“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②祖训，开启晚清近支亲王辅政之路。此举虽为应对太平军北伐的权宜之计，却为后续中枢权力格局变动提供制度参照。其二，临终权力配置。咸丰帝弥留之际，创顾命八大臣与太后钤印辅政设计，看似维系“后宫不干政”原则，实际借“御赏”“同道堂”印信赋予两宫决策参与权。这种过渡性安排虽未实质动摇祖制，却为慈禧介入朝政撕开裂隙。

辛酉政变后，掌权的慈禧、奕䜣集团为巩固权力合法性，亟需理论工具弥合祖制传统与权力现实的矛盾。其编纂本质是对咸丰政治遗产的继承转化：通过系统梳理历代女主临朝案例，将咸丰时期的权宜之举升华为辛酉政变中极力强调的“因时制宜”“事贵从权”③的政治传统。该书在帝师、军机大臣与两宫间定向传播，核心功能是增进两宫政治知识，为垂帘听政建构历史依据，既利用咸丰朝已存的祖制变通作为现实支点，又以“法古”话语淡化制度变革的激进色彩。此等运作体现政治策略性：首先，将两宫垂帘包装为“延续先帝遗制”的政治行为，借咸丰帝临终权力设计赋予其法理延续性；其次，通过类似经筵讲学的仪式化传播，在权力核心层塑造“女主临朝”可行性的认知。

作为特定历史节点思想的产物，《治平宝鉴》的影响亦有局限：其理论建构始终围绕维护皇权稳定展开，传播范围限于政治核心高层，本质仍是危机应对的应急工具。但不可否认，该书通过重构历史记忆，为同治初“垂帘听政”体制提供经验，反映出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变局中的特殊调适路径：当制度存续遭遇危机时，对祖制的弹性解释往往成为维系权力的屏障。

第二，从历史文化传统审视，《治平宝鉴》突出女性执政议题而未遭满洲官僚的抵制，重要因素在于满洲传统较之儒家文化体系存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从历史维度考察，清廷虽奉压制女主干政原则，但满洲传统已存女主执政先例：顺治十八年（1661），桐城生员周南“诣阙条奏”十款，其末款奏请太皇太后“垂帘以襄盛治之隆”，④虽因违制遭拒，却为后世提供制度调整参照。至咸丰十一年辛酉政变前夕，满臣胜保以“因时制宜”为理据，援引多尔衮摄政、孝庄听政的史实，在九月二十八日奏折中提出：“我文皇后当开国初年，虽无垂帘明文，而有听政实用。”⑤此政治传统为制度变革提供历史依据。

在民族社会结构层面，满洲社会对女性的相对尊重为其书写提供重要基础，此类社会基础对慈禧垂帘听政的政治实践具有助推作用，⑥这种文化缓冲亦为《治平宝鉴》的编纂传播减少制度阻力。与儒家“男尊女卑”规范不同，清旗人家庭中未婚女性掌握一定的家事裁决与管理权，其中“姑奶奶文化”较典型。《清稗类钞》“旗俗重小姑”⑦条明载此俗。据溥仪解读，旗人姑娘之尊源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⑧的选秀制度。这种源于满洲原生习俗的性别观念，虽依附皇权体系，但客观上形成女性参与事务管理的文化认同。

第三，《治平宝鉴》作为辛酉政变后权力格局调适的重要文本，其编纂逻辑与政变前董元醇提出“事贵从权，理宜守经”⑨理念一脉相承。该书系统梳理历代贤后事迹，以儒家“亲亲尊贤”

① 《清史稿》卷 114《职官志》。
② 《清仁宗实录》卷 53，嘉庆四年十月丁未。
③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91、100 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 2，顺治十八年三月甲子。
⑤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100 页。
⑥ 赵杰：《满族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东北师范大学校庆丛书编委会编：《尔雅东师》，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405 页。
⑦ 徐珂：《清稗类钞》第 5 册，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212 页。
⑧ 溥仪：《我的前半生》，东方出版社，2007 年，第 28 页。
⑨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91 页。

伦理框架为核心，构建母仪天下理想范式，着重强调血缘伦理与贤臣辅政的互动逻辑。辛酉政变前，董元醇曾以“事贵从权，理宜守经”之论奠定两宫参政的法理基础：所谓“事贵从权”，即主张“亲亲尊贤”的血缘伦理优先；而“理宜守经”则强调通过儒臣经史讲授“辅翼圣德”，[①]其具体方案为：“则当于大臣中择其德望素优者一二人，俾充师傅之任，逐日进讲经史，以扩充圣聪，庶于古今治乱兴衰之道，可以详悉陈说，而圣德日增其高深。”[②]书中对贤后德行的编纂，如汉宣帝王后以“慈爱无异亲生”[③]保全宗族，霍氏家族因“包藏祸心”[④]覆灭等案例，反映编者对“亲亲尊贤”伦理的关注。书中贤后对狄仁杰、张居正等名臣的任用，乃为“尊贤”思想的具象表现：贤臣的辅弼之功乃是母后贤明的映照，如武则天纳狄仁杰谏言却始终掌控决策核心，反映“尊贤”本质上仍是巩固“亲亲”伦理主导的政治秩序。

《治平宝鉴》以儒家“亲亲尊贤”伦理为核心框架，力图系统构建“母教”叙事的政治合法性。《治平宝鉴》倡议者徐启文上奏提出：“勋猷学业，往往以母教而成”，“皇上问视之余，恭承慈训……其裨益圣学，较之讲读外廷，更为亲切”。[⑤]清廷纳其议后，委儒臣编纂，帝师讲授。这种设计使得讲授经史的帝师群体同时承担向太后宣讲该书的职责，讲授过程中，其将“经史讲授”与“女主训政”相结合。

此书讲授活动中，两宫对“母教”伦理的重视得到直接体现。书中通过历代贤后事迹，系统强调母仪教化对帝王教育的意义。而翁同龢日记中频繁记载太后问询同治帝学业进展之事，[⑥]即便在未获询问的特殊场合，翁氏仍特注“未及功课”，[⑦]正与此主旨契合。太后通过听讲《治平宝鉴》，将书中“母教”叙事转化为对帝王教育的实际关注，亦与徐启文倡议“母教裨益圣学”理念相呼应。

第四，综观《治平宝鉴》文本建构与权力叙事，虽力证后权治理合法性，但本质上仍将后权定位为皇权的制度性补充。该书在清朝官书中首度系统整理中古史后妃参政现象，但男性君主历史叙事依旧占据核心地位。全书结构上，其编纂体例与价值取向仍未超越皇权帝制框架，单人条目设置以唐太宗为最，虽将后妃事迹置于官书显著位置，但君王统治经验仍为书写主体。此权力叙事特征在晚清政治实践中延续：垂帘听政终究是“事贵从权”的暂时性政策，需恪守“同心辅弼”[⑧]幼主的礼法边界，实行名义依然是为同治帝“不数年即可亲政”[⑨]作铺垫，故此，其仍旧不得不严格依附皇权制度框架来维系执政合法性。两宫以“皇太后”的法理身份执政，既在形式上循儒家君臣纲常，又借《治平宝鉴》等典籍对史事的选择性阐释，将女性参政规训于“贤明辅政”的伦理范畴，从而有效规避传统政治伦理中的僭越指控。

《治平宝鉴》的政治文化建构，最终服务于慈禧集团的权力博弈。该书讲授活动中宗室领进人员的变动，亦为慈禧与奕䜣政争的缩影，映射慈禧对皇权集中化的追求。该书虽在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五日编成，但迟至同治三年五月方命大臣为两宫授课，起初“由议政王带领进讲”。[⑩]然同治四年三月蔡寿祺弹劾事件后，慈禧罢恭亲王议政王头衔，改派醇郡王奕譞、锺郡王奕詥

①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92 页。
②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92 页。
③ 《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第 194 页。
④ 《故宫珍本丛刊》第 341 册，第 194 页。
⑤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124 页。
⑥ 《翁同龢日记》第 2 册，同治丙寅正月条、二月条、四月条、七月条、九月条，第 472、475、486、509、518 页。
⑦ 《翁同龢日记》第 2 册，同治丙寅九月条，第 518 页。
⑧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92 页。
⑨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104 页。
⑩ 《清穆宗实录》卷 104，同治三年五月癸亥。

等宗室轮流承担垂帘听政“召见、引见”[①]职责，导致《治平宝鉴》讲授中出现不同宗室外戚带领进讲的现象。此次政争中，慈禧虽借弹劾案欲革除恭亲王议政王衔及其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差使，谕令“以后召见、引见等项，著派惇亲王、醇郡王、锺郡王、孚郡王四人轮流带领”，[②]但经群臣抗争后，仍恢复其内廷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职务，唯议政王头衔终未复立。[③]此背景下，此书讲授活动的带领人员出现变动，除诸王爷外，据讲臣所记，奕山、景寿等皇亲国戚亦参与领进，但讲者仍为翁同龢、瑞常、宝鋆等指定大臣。这种带领人选的更迭，反映慈禧通过调整礼仪性职务分配以制衡恭亲王权力的政治运作。

References

Bao Chengguan. *Yixin Cixi zhengzheng ji* (A record of political struggles between Prince Gong and Empress Dowager Cixi). Changchun: Jilin wenshi chubanshe, 1990.

Liu Linhai. *Zhuan shu, kanke yu yingyong: “Di jian tu shuo” yu “Yang zheng tu jie” yanjiu* (Compilation, publication, and application: Studies on *Di jian tu shuo* and *Yang zheng tu jie*). M.A. thesis.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22.

Qiao Zhizhong. “Qing Daoguang chao zhihou ruogan guan xiu shiji lunlüe” (A brief discussion on official historical works after the Daoguang reign). *Hebei xuekan* (Hebei Academic Journal) 37, 5 (2017).

Yu Heping, Xie Fang. *Zhongguo jindai tongshi: Zaoqi xiandaihua de changshi* (A gener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Early attempts at modernization).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2024.

The Compilation Logic and Power Implications of *A Precious Mirror for Governing the Peace* (*Zhiping Baojian*) in the Early Tongzhi Reign

LIU Wei（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148252018@qq.com）

Abstract: *A Precious Mirror for Governing the Peace* (*Zhiping Baojian*) was an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political instruction manual for the Two Empresses Dowager’s behind-the-curtain governance after the 1861 Coup. It systematically compiled historical precedents of empresses’ political assistance, establishing three theoretical pillars: legitimizing female regency, prioritizing moral governance, and synthesizing Confucian sage-kingship with filial ethics. Its compilation aimed to address the Two Empresses’ lack of governing experience. Only 70% of the original text survives as an incomplete manuscript in the Palace Museum Library. Scholarly attention to this work remains insufficient, with persistent factual errors in foundational studies and a notable absence of specialized research on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By examining it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extual cont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risis-driven political-cultural logic and power-legitimizing narratives embedded in the text, thereby excavating its deeper connotations of power.

Keywords: *A Precious Mirror for Governing the Peace* (*Zhiping Baojian*), 1861 Coup, Two Empresses Dowager, compilation logic, power implications

① 《翁同龢日记》第 1 册，同治乙丑条，第 409 页。
② 《翁同龢日记》第 1 册，同治乙丑条，第 409 页。
③ 虞和平、谢放：《中国近代通史》第 3 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 年，第 5 页。